

Russell Jacoby



Picture Imperfect

Utopian Thought for an Anti-Utopian Age

不完美的图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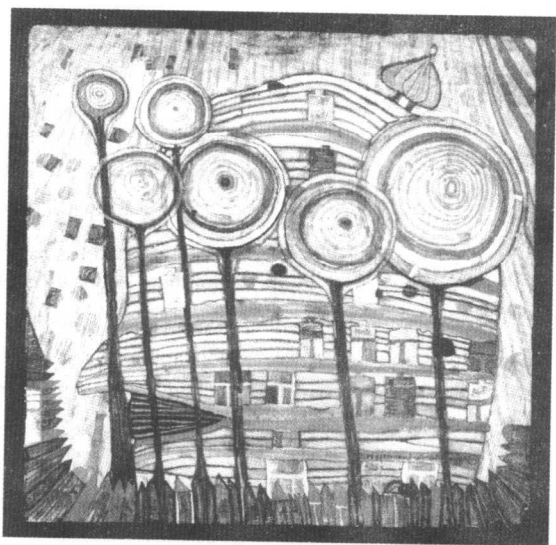
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

[美] 拉塞尔·雅各比 / 著

姚建彬 等 /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Russell Jacoby



# Picture Imperfect

Utopian Thought for an Anti-Utopian Age

# 不完美的图像

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

[美] 拉塞尔·雅各比 / 著

姚建彬 等 /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 / (美)雅各比著;姚建彬等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4

ISBN 978-7-80225-274-5

I.不... II.①雅... ②姚... III.乌托邦—研究

IV.D09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42989 号

---

**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

(美)拉塞尔·雅各比 / 著 姚建彬 / 译

责任编辑:刘刚

装帧设计:林涛 秦崑

---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刚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010-65270477

传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

经销电话:010-65512133

邮购电话:010-65276452

邮购地址:北京市东四邮局7号信箱 100010

---

印刷: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本:960×1300 1/32

印张:8.25 字数:201千字

版次:2007年6月第一版 2007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 001-6 000

书号:ISBN 978-7-80225-274-5

定价:28.00元

---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 致 谢

我写书的一贯做法是,让自己的致谢尽量简洁,本书也不例外。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历史系的好几个同事都细读了本书的好些章节或者回答了我的请教。我要特别感谢戴维·N. 麦尔斯(David N. Myers)、加布里埃尔·彼得伯格(Gabriel Piterberg)和J. 阿齐·格提(J. Arch Getty),并感谢欧洲学术讨论会(The European Colloquium)<sup>[1]</sup>的全部与会者,感谢他们对本书所作的评论以及提出的不同见解。如果没有历史系的主席特奥·茹依茨(Teo Ruiz)和社会科学系主任司各特·沃(Scott Waugh)两人的支持,我就不可能教学、写作并维持生计共举,我对他们心存感激。如往常一样,保罗·布莱勒斯(Paul Breines)出色地审读了本书的好些部分。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彼得·迪默克(Peter Dimock)和普雷简·亚历山大(Plaegian Alexander),从动笔之初就给了我本人和本书以莫大的支持。迈克尔·哈斯凯尔(Michael Haskell)冷静而内行地指导本书的手稿通过了各式各样的陷阱。我也要向保罗·皮孔(Paul Piccone)表达我的敬意。他是《泰逻斯》杂志(*Telos*)的资深编辑,在本书即将杀青之际,他却不幸与世

---

[1] 欧洲学术讨论会(European Colloquium),这是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欧洲研究所主办的常设性学术论坛。——译者

长辞了。毫无疑问,在其著述和辩论中,在其一生的气质中,保罗都将反对墨守成规的知识分子这一形象具体化了,他欣然挑战所有的学术盲从。我必须指出,正是保罗(还有《泰逻斯》)于1978年发表了古斯塔夫·兰道尔(Gustav Landauer)的第一部英文著作,我在本书的研究中纳入了对兰道尔的讨论。人们将会怀念保罗。

最后,我要十分感谢克瑞斯蒂娜·勒任(Cristina Nehring),她既是优秀的语言专家,也是我的至爱。她不仅赋予该书以毫无瑕疵的编辑方面的审慎,而且还将她充满激情的精神和强烈的智慧也融入了其中。

## 中译本序<sup>[1]</sup>

要“内衣”，还是要“香槟”？

“在乌托邦岛国……人人都能够获得公平的配额，从来就没有穷人或乞丐。每个人都不拥有任何东西，但是每个人都很有——还有什么财富能够比快乐、心灵的平和、无忧无虑更加伟大呢？”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认真聆听了乌托邦岛的访客拉斐尔(Raphael)发表的这番关于乌托邦的报告，然后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在莫尔看来，乌托邦的“法律与习俗”似乎“在很多情况下都荒唐到了极致”。不过他还是决定“对其进行认真思考”，而且承认“我将会非常乐意看到——尽管我仅仅是期望——欧洲将吸纳乌托邦共和国的许多特色”。

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Utopia*)一书就是以上述这种方式结尾的。这本书问世已经有五个世纪了。直到今天，我们依旧不清楚莫尔对他所创制的“乌托邦”的真实态度。莫尔以拉斐尔的身份，坚定地捍卫乌托邦；他同时又以自己的身份，强烈地反对乌托

---

[1] 这篇序言系拉塞尔·雅格比应译者之请而特意为其《不完美的图像》一书中译本所撰，其原文标题为《〈不完美的图像〉中译本序》(Preface to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Picture Imperfect*)，译者为这篇译序加了一个标题“要‘内衣’，还是要‘香槟’？”。此一微调，意在提醒读者注意雅格比所揭示出的乌托邦思想史上“蓝图”派乌托邦思想与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思想这两种不同传统之间的张力，以及他所着力的方向。——译者

邦。他真正的立场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对自己所创造的乌托邦的反对，毋庸置疑一直就是一种姿态。他想通过引证自己在书中对乌托邦的反对意见来为自己辩护，以免他人指控他颠覆社会。然而，毕竟是他虚构了乌托邦，倘若它的确令他非常苦恼的话，他原本可以坚持做自己的神学研究。

尽管莫尔本人对于乌托邦的态度是爱恨交织的，但是当今的历史判断却并非如此。这种判断认为，乌托邦是同压制性权力主义以及凶残的计划联系在一起。如果说乌托邦表明的是现代早期，那么敌托邦则意指现在。数个世纪以来，至少在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 1888年发表的整部《回顾》(*Looking Backward*)中，乌托邦就充溢着想像与希望；在乌托邦中，暴力与独裁毫无立锥之地。让我们来听听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说过的话吧。他曾经同布鲁克农场(Brook Farm)这个乌托邦公社有过联系。1840年，他写信给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说，“这里的人们几乎都为不可胜数的社会改革方案而变得有点疯狂了。每一个读书人的背心口袋中都装着新社会的草案……这个人反对吃动物的肉；那个人抛弃金钱；另外有人则放弃家里雇用的仆役；还有人则否定国家。”

自然，乌托邦主义者或许会——而且早已——因为其不现实的、不可能的，有时是精神失常的特征而遭受批判。例如，如果去读傅立叶的著作，他那既汪洋恣肆而又紊乱无序的想像两者都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他所描写的公社中，人们能够一日三餐吃到美味佳肴，面对一道接一道的美食，他们感到无所适从。哪怕是最贫穷的人，也能够从“十二种汤，十二种露珠和葡萄酒，以及十二种肉和蔬菜的调味品”中选择。但是，因为傅立叶这样痴迷于细节和数字——人们应该每天睡5个小时，活144岁，任何活动都不要超出2小时——他看起来也够疯狂的了。

然而，疯狂并不意味着邪恶或危险；事实上，傅立叶本人就完全是仁慈而宽厚的。他的理想既不曾激发暴力，也没有导致劳改

营。但是,这一点却被人遗忘了。20世纪出现了反对乌托邦的思潮。赫胥黎用作其《美丽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题词的那段警句捕捉到了这种转变。他引用的是俄罗斯宗教思想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Nicolas Berdyaev)的原话,后者认为,从前,乌托邦似乎是遥不可及的,但是如今它们却变得迫在眉睫了。“事实上,我们正面临着一种完全不同的、令人苦恼的问题:我们该怎样阻止它们的最终实现?”

别尔嘉耶夫本人逃离了俄国革命,但是人们往往将乌托邦思想的让渡同苏联的解体联系起来。然而,赫胥黎的这部小说针对的是美国的消费主义而不是斯大林的独裁主义。倘若敌托邦的《美丽的新世界》中有一个恶魔的话,那就是亨利·福帝(Henry Ford)<sup>[1]</sup>,他体现了个体的让渡与机械化。一点没错,苏联共产主义的确曾激发了一系列敌托邦作品,特别是叶甫盖尼·札米亚京(Yevgeny Zamyatin)的《我们》(*We*)以及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1984)。纳粹主义的兴起似乎证实了乌托邦主义的危险。

但是纳粹主义几乎没有东西看起来是乌托邦的。正如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指出的那样,纳粹的“血统和土地”这一口号阻碍了,而不是发展了乌托邦。尽管如此,一系列的欧洲流亡思想家,诸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以及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却还是将乌托邦主义、纳粹主义等同极权主义的各个侧面联系起来。然而,如果我

---

[1] 学界一般认为,赫胥黎在《美丽的新世界》中所创造的“Henry Ford”这个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从福特公司创始人福特以及这个公司本身的生产、管理模式获得了灵感。福特所代表的机械化、标准化、同质化,反人性倾向,同乌托邦的本质是相敌对的。从根本上说,赫胥黎塑造这一形象就是为了警醒当代的人类要抗拒这种迫在眼前的压迫、独裁、反人性、单向度化。因此,孙法理等译家将这个人译名为“亨利·福帝”,而不是遵从既有的外国人名中译惯例,是颇为妥当的,庶几能够让我们联想到作者寄寓其中的警示与批判意义。我非常乐意沿用这一译名。——译者



们仔细阅读他们的作品,却并不能发现表明乌托邦思想导致了极权主义的令人信服的证据。以阿伦特的经典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为例。这本书对于反犹太主义、帝国主义与种族主义说了很多,但是却未能揭示出乌托邦主义同这些运动是有牵连的。但是这几乎无关紧要,因为在大众层面和学术圈,两者都经常将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贴上乌托邦运动的标签。

《不完美的图像》(*Picture Imperfect*)一书试图复原乌托邦思想,但是“复原”(recuperate)并非意味着粉饰。如果人们认为乌托邦主义者是有罪的,例如那些以苏联共产主义名义犯下的罪行,就让这些被告承受他们那些控诉吧。不过,在察看历史的碎片时,我们要更加小心谨慎,我们要使用解剖刀,而不是挖掘机。我们也不该忘记,在俄国革命的最初那些年里,至少有一段时间,乌托邦的余火燃烧得特别明亮。但是这个时刻却已经过去,这是一些亲自参加过革命的人很快就认识到了的一个事实。那些使自己远离这场革命的人不仅仅包括了像别尔嘉耶夫这样的基督徒,而且也包括了从尤利乌斯·马尔托夫(Julius Martov)到维克托·塞尔吉(Victor Serge)以及安德烈·布列东(Andre Breton)这样的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乌托邦主义者。无论如何,苏联共产主义及其遗产都几乎没有耗尽乌托邦思想。

我在《不完美的图像》中,与其说是要竭力从乌托邦思想导致了极权主义这一指控中拯救它,不如说是在竭力拯救乌托邦思想本身。虽然有关自由的未来轮廓之大胆理想推动了乌托邦思想,但是,一种相反的、权力主义的倾向,即精确地规划人们应该怎样生活的倾向也是乌托邦思想的特征。我称之为乌托邦思想的“蓝图”(blue-print)传统。这一类乌托邦主义者往往规定:乌托邦的居民应该什么时候醒来,他们该穿什么,午饭应该吃多长时间。当自由的各种精确维度受到限定时,自由本身也将衰落。我认为,这种“蓝图”传统已经寿终正寝了。要详尽无遗地描绘出一个乌托邦社会将会是什么样子,这是再也不可能,或者说再也无法期望的事

情了。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乌托邦计划的让渡。刚好相反。乌托邦计划不仅仍然迫切地需要研究乌托邦主义的历史,而且我还试图抢救一种更加散乱——而且更少人关注——的乌托邦传统,我称之为“反偶像崇拜的”(iconoclastic)乌托邦主义者。我是同时在其精确内涵和流行的意义上来使用“反偶像崇拜”这一概念的。从字面意义来看,反偶像崇拜者指的是这样一些宗教信徒,他们摧毁神的偶像或形象,因为这些图像曾经被认为是异端;这些形象破坏了圣经关于禁止用视觉再现上帝的戒律。从其更为流行的意义来看,反偶像崇拜者指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逆潮流而动,挑战种种盛行的真理。就这两方面而言,反偶像崇拜这个标签都是贴切的。

那些乌托邦主义者之所以是反偶像崇拜者,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理智上不墨守成规,而且还因为他们拒绝将未来具像化。尽管他们大部分是俗世凡人,而不是虔诚的犹太教徒,但是他们却严格地遵从犹太教的如下诫律,即禁止为上帝造偶像,不许为上帝命名。这些诫律证明了上帝的崇高,即他是不受限于图像和语词的。乌托邦以反偶像崇拜者的同样方式打破了视觉再现的限制;只能间接地通过音乐、哲学与故事,而不是通过绘制图表,栩栩如生地去探究、接近乌托邦。在这些人的作品中,人们找不到关于未来的详尽蓝图。相反,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主义者赋予耳朵,也许还有心灵,在眼睛之上的特权。他们的作品中往往充满一种神秘的氛围,这在反偶像崇拜论者的经典作品,即布洛赫的《乌托邦的精神》(*The Spirit of Utopia*)中得到了证明。布洛赫的这部书并没有提供乌托邦的图像,而是从音乐、宗教和艺术中来引证乌托邦。

这些反偶像崇拜的思想家们还探讨了乌托邦传统的另外两个弱点,它们同今天仍然大有关系。他们意识到,乌托邦渴望并不会立即看上去是充分发展的。这一看法丝毫也不让人感到惊奇。历史已经诽谤并且蹂躏了这种乌托邦渴望,当人们要求它说话时,乌托邦冲动往往发现自己变得结结巴巴了。为了让它发表意见,我

们就必须保护它、栽培它。这或许就是佩特·赫贝尔(Peter Hebel)所讲述的那个童话故事中的寓意。有一对穷夫妻,得到了可以用于任何事情的三桩心愿,却为了得到早餐的香肠而把它们糟蹋了。

它或许还是一个曾经令本雅明和布洛赫两人都着迷的故事的寓意;这个故事或许例证了乌托邦期望的谦虚谨慎。有个安息日的晚上,在一个哈西德人的村子里,当地人坐在小酒馆里;远远的角落里,有个穷人悄悄地坐在那儿,谁都不搭理他。村民们决定,每个人都要说出一桩心愿。

有的人想要钱;有的人想要招赘女婿;有的人则梦想一张新刨床;大伙就这样轮流说着。都说完之后,只剩下坐在黑暗角落里的那个乞丐了。他极不情愿、吞吞吐吐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希望自己是个国王,权力无边,统治着一个广大的国家。有天晚上,当我正在自己的寝宫里酣睡时,敌人来侵略我的国家,却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我从睡梦中被叫醒,连穿衣服的工夫都没有,只好穿着内衣仓皇出逃。我没日没夜地翻山越岭,穿过森林,慌里慌张地往前赶,最后终于安全地到了这儿,坐在了这个角落里的桌子旁。这就是我的心愿。”其他人觉得难以理解,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有人问道,“那么这个心愿对你有啥好处呢?”乞丐答话了,“那样我就会有一件内衣呀。”

“我就会有件内衣”这一说法似乎昭示着乌托邦渴望的终结;这不仅意味着对人的命运的逆来顺受,而且事实上是对它的美化。这个故事暗含了这层意思,即乌托邦梦想本身需要教育。虽然这些故事的背景都是前工业时期的欧洲,倘若它们无法针对后工业时期的世界的话,那很可能针对的是工业化时代。本已变得贫乏的梦想或许会使前工业时代的贫困与后工业时代的富足两者都遭

受痛苦,因为它正在抽空乌托邦思想。为了存活下去,乌托邦精神既需要理智上的大胆,也需要理性的想像力。

与此同时,必须将乌托邦精神从其历史的禁欲主义中解放出来。除了像傅立叶这样一些伟大的例外,乌托邦主义者都赞美匮乏——即共享的贫困。然而匮乏或者自我否定并非内在于乌托邦传统的。这一点,德国作家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或许说得最为出色了。同革命者提出的面包是“人民的权利”这句口号相比,他更加乐意称之为“神圣的权利”。“我们同参加法国大革命的人在这一点,以及其他许多事情上都有着很大的不同。我们不想成为无套裤汉,不想做普通的公民,也不想当腐败的长官;我们渴望建立一种诸神的民主政权……你们要求的是粗朴的衣服,自我克制的道德,以及没有情趣的快乐,但是 we 希望的则是甘露与佳肴、馨香祭物、华丽的红袍、昂贵的香膏、奢华与绚丽、欢笑的宁芙女神翩翩起舞,音乐和喜剧。”海涅又补充说,“你们这些善良而贞节的共和主义者,不要为此事而生我们的气。对于你们吹毛求疵的责骂,我们将用莎士比亚笔下一个傻瓜的话做出如下回答:‘难道因为你们自己是善良而贞节的,就认为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更加可口的蛋糕、更加醇美的香槟了么?’”

1912年,在马萨诸塞劳伦斯的纺纱工人大罢工中,这一思想再次以多少有些单调的语言浮现出来。这是移民和妇女要求更高工资的一次大罢工——但是并不仅仅如此。来自那次罢工的战斗口号宣布,“我们要面包,我们也要玫瑰!”今天乌托邦主义者除了反思这些话,他们所能够做的不会比这更出色。

非常感谢译者姚建彬,让中国读者能够看到我的这本《不完美的图像》。

拉塞尔·雅各比

2007年1月

于洛杉矶

# 前 言

“目前,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建立空中楼阁”,刘易斯·曼弗德(Lewis Mumford)在他1922年出版的《乌托邦的历程》(*The Story of Utopia*)一书中这样写道。四十年后,他却对此深感困惑:自己当初怎么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过去之际表达出如此乐观的情绪。“我仍然生活在上个世纪充满希望的精神中”,曼弗德如是解释说。“19世纪蕴藏着令人振奋的乐观主义,强健的社会进取心”,这个伟大的世纪一直在推动着他从事写作。<sup>[1]</sup>

如今,只有历史上冥顽不灵的人才会相信建立空中楼阁是极其紧迫的事情。振奋人心的理想主义也早已销声匿迹。在当今这样一个充满恒久危机的时代,我们变成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专注于对此时此地的调整,而不是去重新创造。这种情况也许有利于书写反对历史的特性,有利于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而不是在这个时代的推动下进行写作。在一个凭理智来优选精神<sup>[2]</sup>的时代,我关注的却是其他时代的乌托邦精神(u-

---

[1] 刘易斯·曼弗德:《乌托邦的历程》,纽约:维京出版社,1922年初版,1962年修订版,第307页。

[2] 优选精神(Triage),国内的汉英词典上一般解释为“治疗类选法”。该词来自法文,意指“分类”,而这个法文词本身又源自拉丁文中的tria,意指“三”。从词源上考察,这个术语意指将事物分为三类,而如今它所指称的情况并非必然如此。大多数人认为,现代人所指称的triage要归(转下页)

topian esprit)。

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跳出他或她的历史的影子。任何有关乌托邦精神的研究都必须在其当前的情形中展开。如今,大多数观察家都断言,乌托邦主义者或他们的同情者往好里说是有勇无谋的梦想家,而往差里说则是凶残的极权主义者。后一个,而不是前一个诉状,引起了我的关注。它仅仅依靠对历史记录 readings——实际上是依靠对诸如《一九八四》这样伟大的“反乌托邦的”长篇小说的读解——那是极为不妥当的。它依赖于将“乌托邦的”这一范畴扩张到包括任何一种关于未来社会的观念,无论这社会是多么恶劣或多么不排外。

从希特勒(Hitler)到波尔布特(Pol Pot)的每一位 20 世纪的独裁者以及 21 世纪的每一位恐怖主义分子都被贴上了乌托邦主义者的标签。最近在巴黎和纽约举办的一场关于乌托邦的展览包括了以色列集体农庄(Israeli kibbutz)和纳粹集中营(Nazi concentration camp)的照片,似乎每一张照片都代表了一种可行的乌托邦。

乌托邦的传统也许是散漫的,但是上面提到的乌托邦却消失成了虚无和万有。就历史浸透着乌托邦思想(utopian thought)而言,没有单一的定义能够规定它的本质。然而,在过去的数千年里,一些诺言始终如一地体现了乌托邦的特色。从希腊和罗马有

---

(接上页) 功于拿破仑军队中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多米尼克·让-拉瑞(Dominique Jean-Larrey)。正是此君想出了这个办法:对战场上的伤员进行快速评估和分类,然后根据紧迫性、生存的可能性、可供利用的医疗资源等参数决定给哪些伤员进行优先治疗,即使战争还在进行也无妨,这种评估和分类不考虑伤员的军衔。其后,俄罗斯的外科医生尼古拉·皮诺戈夫(Nikolai Pirogov)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也运用并发展了这一分类体系。关于这一术语的起源和演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参阅 OED(第二版,第 17 卷,第 496 页,牛津:克拉任顿出版社,1989 年)和以下链接 <http://en.wikipedia.org/wiki/Triage#History>。作者在此使用这一术语,意在表明对当今时代的理想缺失及知识分子思想退化状况的批判。他认为大多数知识分子目前所做的研究仅仅满足于快速止血式的定位,而不是去寻求进行更大范围的精神救赎。——译者

关“黄金时代”(“golden age”)的思想到 19 世纪对魔力王国的幻想,以及关于和平、闲适和富足的观念均表明了乌托邦的特征;人们往往将它们同普世的兄弟情义和共同的工作联系在一起。在奥威德(Ovid)笔下的“黄金时代”(“age of gold”)里,“有生命的动物互相信任”。城市并不是矗立在“高墙和桥梁后面”。“铿铿锵锵的剑”声也并没有打破和平;土地生长出“财富,一如树上挂着果实一样”。〔1〕如果跃过几千年,抵达现代的乌托邦小说,人们就会发现类似的观念。在 1910 年的《绿宝石城》(Emerald City)中,L. 弗兰克·鲍姆(L. Frank Baum)把奥茨国(Oz)描绘成一个不知道疾病或贫穷为何物的地方,那里也很少见到死亡:人们仅仅横死于不幸的事故。“这里没有穷人……因为这里没有像钱这样的东西……每个人都可以从邻居那里免费获得他为了自用而要求的无论什么东西……每个人一半时间工作,一半时间游戏。”奥茨国的居民是“爱好和平的、心地善良的、非常钟情而且非常快乐的”。〔2〕

我驳斥如下这种看法:纳粹的意识形态也属于上述这一乌托邦传统。我认为,纳粹对种族纯粹性、战争和国家的全神贯注与经典的乌托邦主题毫无共同之处。在他 1930 年出版的《20 世纪的神话》(Myth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纳粹政权(the Nazi Reich)的奠基性文本——中,阿尔弗雷德·卢森堡(Alfred Rosenberg)也许梦想着一种“全新的人的类型”以及一种“全新的生活观”,但是雅利安人的纯粹性和德国人的铁拳却明确界定了这种未来。他这样写道,“尽管一个民族仍然能够使自己摆脱政治上的奴役,但是它绝不能使自己再次摆脱种族污染。”在卢森堡看来,“黑人或犹太杂种”正在淹没德国。必须将他们灭绝。“问题仅仅在于,正在觉醒的德国什么时候将达到用铁扫帚以及无情的原则来

〔1〕 奥威德:《变形记》,贺拉斯·格雷高利英译,纽约:斯格奈特出版社,2001年,第33页。

〔2〕 L. 弗兰克·鲍姆:《绿宝石城》,纽约:多佛出版社,1910年初版,1988年重印,第30—31页。

实行残酷净化的阶段还不能肯定。”〔1〕甚至在纳粹掌权之前，他们的意识形态就更加接近提倡种族灭绝而不是提倡乌托邦式的和平与兄弟情义。

更加晚近的全球恐怖主义——经常被人认为是宗教的狂徒——的泛滥也不能被归因于乌托邦主义者。国防部的一位官员告诉我，“像共产主义一样”，激进的伊斯兰教也“允诺了一个乌托邦”。〔2〕但是，激进的伊斯兰分子寻求的是哪一类乌托邦呢？他们使用的是什么方法呢？查尔斯·傅立叶（Charles Fourier），这位伟大的19世纪法国乌托邦主义者，曾设想过一个充满性爱的和味觉快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即使最节制的个体也能够享受各种各样的爱人和美味。为了实现他的观念，傅立叶著书立说，纠缠有希望的支持者，甚至在一个场合竭力怂恿人在巴黎之外为公社买下一块地。萨义德·奎特布（Sayyid Qutb），这位通常被认为是20世纪穆斯林兄弟情义（the Muslim Brotherhood）和激进的伊斯兰教之源泉的埃及人，却总是对傅立叶鄙夷不屑，看不起他所描述的一切。〔3〕

奎特布拒斥所有形式的“异教”——自由主义（liberalism）、现世主义（secularism）、性开放（sexual openness），当然，还有犹太教。“大多数试图摧毁所有价值和所有对于人类而言神圣东西的邪恶理论全都是犹太人首倡的。”〔4〕奎特布拥护吉哈德（Jihad），因为它寻求“真主（Allah）的确立……以及神圣的沙里阿（Sharia，伊斯

---

〔1〕 阿尔弗雷德·卢森堡：《20世纪的神话》，加利福尼亚纽波特彼齐：努恩泰德出版社，1930年初版，1982年重印，第333页。

〔2〕 《国防部副部长就道格拉斯·费斯向参议院提交的外交关系政策所作评论》，美国联邦新闻署，2003年11月13日。

〔3〕 大体参看罗克萨尼·L. 尤本：《镜中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及现代唯理论的局限》，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3—92页。

〔4〕 奎特布，转引自保罗·伯尔曼：《恐怖和自由主义》，纽约：诺顿出版社，2003年，第86页。



兰的律法)的统治”〔1〕。虽则傅立叶嘲笑牧师,并且谴责通奸的哲学家(他们自己往往就通奸)的伪善,虽则他提议将妇女从“文明的”压制之下解放出来,但是奎特布却详细说明了通奸的“严厉的”惩罚。他在《论伊斯兰教中的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 in Islam*)中这样写道,“对于已婚的男人和女人来说”,通奸就要“用石头砸死”;对于未婚的男女来说,私通就要“鞭笞一百下”,那通常是致命的。其他的违法行为也用类似的方式来惩处。偷盗的惩罚“是绑在铡刀上砍掉一只手;第二次再犯就砍掉另一只手;第三次就砍掉一只脚,然后再砍掉另一只脚”〔2〕,这哪里有同乌托邦的联系呢?

固然,关于乐园(paradise)、平等(equality),以及自由(freedom)的观念也出现在跟奎特布一样的激进伊斯兰分子的著述中。但是,少数的几个短语,或者甚至很少的几个句子和段落,并不能构建一个乌托邦美景,这同经典的乌托邦有很大的距离。9月11日领头攻击世贸中心的劫机犯穆罕默德·埃塔(Mohammad Atta)在给他同胞的最后信息中这样写道:“你们知道,乐园已经(为你们)而美化了,美丽的天使穿上她们最美丽的服装之后在召唤你们了”,他接下来的一句话就是命令他们:如果他们有幸“屠杀一名乘客,他们就应该以自己父母的名义这样来做:动手割开那名乘客的喉咙,就像割开宗教仪式上动物的喉咙那样。〔3〕将此与莫尔(More)的《乌托邦》(*Utopia*)进行比较,后者从年代上说早了五个世纪,而从精神上而言较前者晚了十个世纪。在莫尔笔下的乌托

---

〔1〕 马利斯·鲁斯文:《为上帝而怒:伊斯兰教徒对美国的攻击》,纽约:格兰塔图书公司,2002年,第90—91页。

〔2〕 萨义德·奎特布:《论伊斯兰教中的社会正义》,纽约万昂塔:伊斯兰国际出版社,2000年,第90—91页。

〔3〕 参看鲁斯文所著《为上帝而怒》第37页中对这一文献的讨论。这一文献的完整文本已经广泛地发布在互联网上了。诸如:[http:// abcnews. go. com/sections/world/Dailynews/attaletter\\_1. html](http://abcnews.go.com/sections/world/Dailynews/attaletter_1.html).